学术专论

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 ——关于满汉两种仪式的共处情况

[日] 楠木贤道

〔摘要〕 本文通过探讨清朝第二代君主皇太极在太庙祭奠祖灵、进献供品的具体情况，考察了当时清朝内外的政治情况和皇太极本人的宗教观。皇太极在当时导入中华王朝式的仪式，有意识地创造了和满族传统仪式共处的状况。祭天仪式也好，祭祀祖先也罢，并没有排除满族传统的仪式，也没有使两者融合。原因在于保持民族意识须要满族传统的仪式，而为了成为中华世界的政权须要中华王朝式的仪式，二者皆其需要。皇太极虽然很热诚地导入中华王朝式的仪式，但根本上还是灵活地站在其基于满族政权现实的需要上。

〔关键词〕 皇太极 满洲 堂子 祭祖 仪式 中华王朝 满汉关系 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 K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1)-01-0124-06

The Sacrificial Shrine of the Imperial Clan and Rituals Performed by Hong Taiji in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Co-existing Situation of Manchu and Chinese Ritual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Hong Taiji's Reign and his concept of religion by describing how Hong Taiji treated his ancestral spirits in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and how he made offerings to them. Hong Taiji introduced into later Jin Dynasty Chinese rituals and made them co-existing with Manchu traditional rituals. In the Heaven and ancestral offerings, neither did he exclude the Manchu rituals, nor infused Chinese and Manchu rituals into one. Hong Taiji needed the traditional rituals to maintain Manchu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Chinese rituals to be approved as a new dynasty in greater China. Although Hong Taiji was a great advocate of the Chinese rituals, he took a rather realistic and utilitarian attitude toward introducing Chinese rituals into the Manchu regime.

一、前言

本文通过探讨清朝第二代君主皇太极(1592—1643)祭祀祖灵、进献供品时的具体情况，考察当时清朝内外的政治情况和皇太极本人的宗教观。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是统合东北亚、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

西藏等内陆亚洲地区的一大帝国。其领土的大部分由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所以它又是创造当代中国版图和民族构成的王朝。

仅作为辽东边外一首领的努尔哈赤(1559—1626)，至16世纪末期，武力统一了属通古斯系的建州女真，接着又收拢北邻的海西女真大部，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国。从这一时期起开始自称为满洲(Manju)。不久努尔哈赤就宣布与当时的中国王朝之明朝开战，

〔收稿日期〕 2010-09-14

〔作者简介〕 楠木贤道(1961—)，男，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准教授

获取辽东东半部后迁都沈阳（即后来的盛京）。

继努尔哈赤之位的皇八子皇太极，在军政方面首先渡过辽河，沿渤海湾进军，攻破了明朝的一些据点，但因受到明军的顽强抵抗使其战线陷入胶着状态。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皇太极遂率军北上，从今天的内蒙古东部迂回向西，来到北京北面后直转南下，越过长城多次侵入华北地区。另外在这种反复的进军过程中，皇太极又与漠南蒙古诸部进入交战状态，成功地使继元朝皇帝的直系大汗所掌握的察哈尔部服属于自己。至此，皇太极于1636年在沈阳改国号为大清，为与明朝的崇祯相对抗，定年号为崇德。从此作为满洲的汗，蒙古的大汗，中华世界的皇帝，集此三种面目于一身再次登基称帝。

从这一时期起，皇太极在统治理念和国家制度中，除了满族传统之外，开始逐步导入蒙古和中华式的要素。

二、皇太极导入的皇帝仪式之一： 祭天仪式

中华世界的皇帝应当要进行的仪式中，最为重要的要数祭祀上天的天坛仪式和祭祀祖先的太庙仪式。这是因为，通过进行这样的仪式皇帝向民众表示其皇权统治的正统性。

天坛仪式，基于“皇帝乃天帝之子，委以天命统治天下”的天命思想，在皇帝登基的当天和每年的冬至举行。皇帝登基当天在天坛举行的仪式，是皇帝作为接受天命的新任天子而对天帝进行的宣誓行为。相对于此，每年冬至举行的天坛仪式与天下政治（人事）和自然现象（天事）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天子的皇帝，其行为往往以自然现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行恶政则降临天灾，行善政则出现吉兆”，基于这样的天人合一理论，皇帝要在冬至这一天向天帝起誓自己要行善政，祈愿明年五谷丰登。

皇太极正是配合自己即位大清皇帝的登基大典，导入了天坛仪式。崇德元年四月初八日，被满洲、蒙古、汉人之王公、大臣推举为皇帝的皇太极，从次日起开始斋戒，十一日举

行祭祀天坛的仪式，完毕后立即登基称帝。

那么，在导入这样的天坛仪式之前皇太极是否有过“天崇拜”信仰呢。答案是肯定的。与基于天命思想、天人合一理论的中华世界的天和天帝相区别，满族也有他们固有的“天崇拜”及“诸神信仰”。在皇太极日常生活的盛京皇宫清宁宫内，祭祀着各式各样的神灵。皇太极还在盛京城东面抚近门外三里远的地方建造堂子，里面祭祀过叫做阿巴卡（Abka）或纽欢台吉（niohon taiji）的天，以及叫做武都本贝子（uduben beise）的始祖。

《满文国史院档》天聪八年正月元旦条中记载“五更，诸贝勒集于汗衙门。寅刻，汗率诸贝勒大臣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这里描述的是，堂子内之亭式殿举行的元旦祭天仪式。本来皇帝应该接受朝臣的三跪九叩头之礼，但是在这里皇帝却带领诸贝勒大臣等，对天进行祭拜。此外《满文国史院档》天聪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条中还记载“天聪汗亲率大贝勒……于卯刻，出盛京城东抚近门至堂子，列八纛，吹磁螺、喇叭、琐呐拜天。毕。大军西行”^①。堂子内立八杆纛祭天的这种仪式，它的举行时间大多是在向天报告出征和获取捷报之际。其次日皇太极即率领军队出发，直接去远征察哈尔。除此之外，还有被叫做立杆大祭的仪式。这种仪式是在堂子内立一棵上端带有托盘的被叫做索伦杆的棹子，托盘内盛肉等食物而对天进行供养。

以上这些在堂子内举行的祭天仪式，都没有司仪人员参加。从史料内容可知是皇太极自在进行祭祀，表明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1644年起清朝开始统治中国内地之后，在北京也建造了堂子。一直到清末为止，堂子内的祭天仪式完全是作为满族固有的仪式延续下来的。

综上所述，自1636年导入天坛仪式之后直到清末，堂子内满族固有的祭天仪式和在天坛举行的中华王朝式的祭天仪式一直是并存的。清朝认为堂子内祭祀的天与天坛上祭祀的天没有什么差异，但同时认为仪式的方法中自应含有其固有的理论而并没有将两者融合，也没有将一方废除。堂子仪式和天坛仪式的并存，象征着清朝这样一个以皇帝为顶点的少数

满族统治拥有大多数民众的中华世界的政治现象。即，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识要举行堂子仪式，而作为清朝，为了获得中华世界的承认要举行天坛仪式，二者缺一不可。

三、皇太极导入的皇帝仪式之二： 祖先祭祀

父系氏族（宗族）安置自己祖先牌位，对祖先进行祭祀的亭庙，叫做宗庙。而祭祀以王朝肇建者初代皇帝（太祖）为首的历代皇帝的宗庙，则被称之为太庙。即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的亭庙。太庙仪式与皇帝登基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向先帝报告的仪式来表明登基大典的结束。相对于登基大典时的太庙仪式，作为年中惯例而举行的太庙仪式，却如同一般宗庙活动，在清明、中元两节热热闹闹地举行。

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通过分析《礼记》，论述道“君主的灵魂在其余命（君主死后失去其个性而被视做一般祖灵之前的状态）的最初阶段时，每个月都要进行供养”^②。如其所论，在太庙里，除清明、中元两节之外也进行频繁的供养，在表示季节变化的农历一月、四月、七月、十月，也上供季节性的食物，称作“时飧”。还有，在其他月份也时常上供食物，称作“荐新”。有时也合并“时飧”和“荐新”，一同呼为“荐新”。

皇太极在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登基大典仪式完毕之后，立即导入太庙仪式，派超品一等公杨古礼为代表的满、蒙、汉诸大臣到太庙，向祖先报告了他登基为皇帝的事（有司摄事）。次日，在太庙又亲自举行了祭祀仪式（皇帝亲祭）。

当时的太庙，是迎合皇太极的登基大典在盛京皇宫东面的抚近门外5里地方营造的。以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皇后（即皇太极生母孟古格格之孝慈高皇后）为中心，合祀着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祖父觉昌安、曾祖福满、高祖都督孟特穆、族祖礼敦巴图鲁。此外还陪祀有努尔哈赤生前的两位勋臣额亦都和费英东。

在导入这样的太庙仪式之前，可以断定皇太极没有“祖灵崇拜”信仰吗？当然问题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导入太庙仪式之前就已经

在堂子内祭祀着叫做武都本贝子的始祖。只是，在太庙中合祀的塔克世、觉昌安、福满、孟特穆、礼敦巴图鲁，他们在系谱关系和个人事迹上已成为大家所公认的认识，即仍然是保持生前个性的祖灵。相对于此，武都本贝子则被认为是很久以前即已存在的，即已失去个性作为一般祖灵而存在。

当初，努尔哈赤与其皇后被安葬在了沈阳东面的福陵。塔克世、觉昌安、福满、孟特穆、礼敦巴图鲁等，虽被改葬在辽阳郊外的东京陵，但因与沈阳较近而皇帝经常亲自去举行祭奠仪式，有时也“有司摄事”。只是将他们的牌位集结到一起同时进行祭祀的仪式是太庙仪式导入之后的事情罢了。

历代王朝，建立了太庙制度之后，在皇帝所应进行的祖先祭祀中，往往太庙仪式逐渐受到重视而亲赴祖陵进行祭祀的仪式慢慢变得微弱。但是有清一代，即使在迁都北京的1644年以后，历代皇帝也经常亲自奔赴位于沈阳的努尔哈赤福陵和皇太极昭陵，以及改葬塔克世等的位于清朝发祥地抚顺东边的永陵进行祭奠，称为“东巡”。从这点可以说清朝是个非常重视祖陵祭奠的王朝。

四、关于向太庙进献供品

查《内国史院满文档》，可知在太庙仪式导入后的崇德元年的记录上，并没有记载每个月所应进行的“荐新”一事。而崇德二年档只残留着两个月的记录。崇德三年档现存有全年的记录，记载着每个月进行过的“荐新”内容。在此录出元旦到中元节在太庙进行的仪式记录，表示如下。为了明确它的季节性，在此一并附加阳历^③。

①（正月初一日/2月14日）味爽，亮钟，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文武诸臣，齐集于大政殿序立毕。寅刻，圣汗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及文武大臣为首者，出东抚近门，派大臣至太庙点香灯。汗率众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仍由抚近门还宫。卯刻，升清宁宫拜神祇。

②（二月十七日/4月1日）（礼部）参政朱世奇和蔡永年往太庙，点香灯，供献鲫鱼

(ooha nimaha)、韭菜 (sengkule)、藜蒿菜 (empi sogi)、香肠 (sija)、大葱 (elu)。

③ (二月二十四日/4月7日) 文武大臣往太庙, 点香灯, 献酒、果品, 致祭。承祭者达尔汉额駙, 进杯者喀恺、巴山、喀喀穆, 敬献者扎木巴、罗奇、巴哈纳。

④ (四月十五日/5月28日) 礼部参政蔡永年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生菜 (namu)、菠菜 (bula sogi)、芹菜 (cin sai)、芸苔菜 (yun tai sai)。

⑤ (同上四月十五日/5月28日) (礼部) 参政朱世奇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蕨菜 (fuktala sogi)、嫩鸡 (fioha koko)。

⑥ (四月二十六日/6月8日) 和硕豫亲王家送王瓜 (nase hengke)。是日, 皇帝命礼部参政温都礼、郭汝吉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王瓜。

⑦ (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 多罗贝勒豪格家送樱桃 (ingtoo)。是日, 皇帝命礼部承政祝世昌, 参政温都礼、郭汝吉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樱桃。

⑧ (五月十一日/6月22日) 礼部参政温都礼、郭汝吉, 启心郎祁充格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子鹅 (? oron niongniyaha)、桑葚 (nimala)。

⑨ (五月十六日/6月27日) 和硕豫亲王家送杏子 (guweilehe), 十七日礼部承政姜新、启心郎祁充格、参政温都礼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杏子。

⑩ (六月一日/7月11日) 和硕豫亲王家送茄子 (hasi), 礼部承政古鲁克达尔汉、祝世昌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茄子。

⑪ (六月四日/7月14日) 和硕豫亲王家送李子 (foyoro), 礼部承政姜新, 参政瓦虎达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李子。

⑫ (六月七日/7月17日) 和硕睿亲王家送甜瓜 (anju hengke), 礼部承政古鲁克达尔汉、祝世昌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甜瓜。

⑬ (六月十日/7月20日) 汗家送雉 (šoron olguma), 和硕豫亲王家送枸杞 (una), 承政萨壁汉、姜新往太庙, 点香灯, 供献雉和枸杞。

⑭ (七月十五日/8月24日) 圣汗率诸

王、贝勒、贝子, 斋戒三日, 于太庙宰牛羊, 准备各种祭品祭祀……先例祭太庙毕, 汗不食胙, 后来定汗先食, 而后再让众人食。

从①可知, 元旦早朝皇太极首先来到堂子, 亲自举行祭天仪式。相对于此, 与堂子同在一个方向的太庙仪式, 则是通过“有司摄事”来进行的。表明堂子中的元旦拜天仪式比在太庙的祭祀祖先仪式还要重要。另外, 回宫之后皇太极又进入自己的居室清宁宫, 再祭祀满族传统的神祇。就这样皇帝皇太极的新年从对天、祖灵、神祇的仪式开始了。

④—⑬的内容, 记载的是向祖先时常进献供品的“荐新”。这是由担任司仪的礼部官员来进行的“有司摄事”。这里通览每个时节所献的供品, 除了二月十七日的香肠是半加工品外, 剩下的全是没有经过加工的食品。可知这是在遵照前述中国旧有的太庙祭祖传统进行祭祀。在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中, 规定供品一定是子孙家里自产的食物。另外, 在进献供品的人物中, 和硕豫亲王出现过5次, 多罗贝勒豪格出现过1次, 和硕睿亲王出现过1次, 皇帝皇太极出现过1次。而这里的和硕豫亲王, 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努尔哈赤正妃乌喇那拉氏所生的最小嗣子, 皇太极的异母弟。豪格是庶妃所生的皇太极长子。和硕睿亲王, 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袞, 多铎的同胞兄弟。以上的多铎、多尔袞、豪格, 他们三位是分别领有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的宗室王公, 曾经参与过由率领各旗的宗室王公所组成的带有联合政权性质之清朝的国政。

史料中多铎进献过5次, 这比较突出。再加上同胞二兄多尔袞的1次, 一共6次。努尔哈赤一生共娶正妃4人。第4位乌喇那拉氏所生的多尔袞、多铎, 依照北方民族的习惯, 在其父努尔哈赤死后领有父亲直属的镶白、正白两旗^④。努尔哈赤死时, 他们尚年幼, 但在此崇德三年时已长大成人, 并积累有一定的军事、政治经验。他们以继承努尔哈赤强大军事力量和丰富人事资源为背景, 在国家政治中握有很大的发言权。虽然祭祀自身是通过礼部的“有司摄事”来进行的, 但供品主要是由正妃乌喇那拉氏所生的多尔袞、多铎俩同胞兄弟准备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作为努尔哈赤直属

军团的继承者，他们从皇太极处分割到了祭祀祖先的一部分权利。

其次，史料中记载的供品是由汗“家”、和硕豫亲王“家”、和硕睿亲王“家”、多罗贝勒豪格“家”提供的。这意味着，皇太极、多尔衮、多铎、豪格没有从王朝的统治机构里面征收供品，而是从他们各自的生活空间，即他们所属的宫廷、王府、及郊外的庄园中提供供品。因为这符合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仪式中供品必须是子孙自产食物的规定。在当时盛京城内的正中央建有皇宫，周围立有占地面积相当大的王府，郊外分布着皇帝和王公们的庄园。樱桃等水果很可能是从各自王府的庭院里摘的。家禽、野鸟和鱼等供品，王府各自的庄园内都有饲养，也可能是捕获的。而蔬菜呢，以上两种皆有可能。

我们审视供品的名称可知，芹菜、芸苔菜、樱桃是从汉语直接借用的。相对于此，其他的供品都带有满语独自的名称，表明这些供品都是来源于满族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而且，在以上这些供品中，含有很多清朝模仿明朝太庙的“荐新”。明朝在太祖朱元璋登基时的洪武元年（1368），决定在每个月的初一日向太庙进献“荐新”^⑤。对比明朝规定的供品和上述史料中出现的供品，发现鲫鱼、韭菜、生菜、藜蒿菜、菠菜、嫩鸡、王瓜、樱桃、子鹅、杏子、李子、甜瓜是重叠的，这些占上述史料中出现的供品的6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明朝制定这一制度时的都城在南京，气候比沈阳温暖得多。为此清朝实际进献的月份与明朝制度中规定的月份有很多不相一致的地方。虽然月份不一致，但从满族日常生活的食物中尽量照搬明朝的规定来搜集供品这一点，可以感知清朝当时在导入明朝制度时的努力精神。还有，清朝的“荐新”不像明朝制度那样每月初一日进行，而是随到随供。这可能与供品不容易到手有关。虽然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非常认真对待祭祀活动的痕迹。

③中的二月二十三日是这一年的清明节，这次的祭祖也是由“有司摄事”来进行的。只是没有让礼部官员出面，而是由活跃于努尔哈赤时代的功臣、达尔汉额驸代替皇太极来进

行的。达尔汉额驸，出身有实力的郭络罗氏，母亲是努尔哈赤的胞妹，妻子是努尔哈赤的第二女，他是通过婚姻与努尔哈赤建立密切个人关系的功臣。崇德三年时，他是皇太极长子豪格所领的正蓝旗（也可以说是皇太极的直属旗）的固山额真。照此，达尔汉额驸比起一般荐新代理人品级确实高出很多，也可知清明节的仪式比“荐新”更受到重视。而且达尔汉额驸是与已成祭祀对象的努尔哈赤和执行祭祀的皇太极都有密切关系的功臣，是担当祭祀代理人的最佳人选。

⑭中的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这一天皇太极亲自举行太庙祭祖仪式。可以理解中元节的仪式是太庙仪式中最重要的仪式。太庙前作为牺牲的牛羊被屠宰，其肉用来祭供祖灵。仪式结束后，皇太极亲自在吃祭肉，可能肉在当场即被煮熟。从仪式结束后皇太极进食祭肉的情景，笔者想起了前述葛兰言同样在分析《礼记》后关于中国古代君主的祖先祭祀道出的一句话，葛兰言总结道，“同祖先之间的交流，是通过禁欲式地严守戒律的蛰居所发出的光明来达成的。是由满怀孝心的嗣子向祖先进献供品，首先祖先进食，剩下的由嗣子来吃完，这样的进食行为来补充完成的”^⑥。但是，“在君主的宗庙，因次子以下的儿子不是君主（葛兰言是以皇长子继位制为前提展开论述的）而不能与作为君主的祖父一同进食。他们要与祖父弟弟的灵魂一同分享供品”^⑦。但这样的论述又与皇太极实际的祭祀行为产生着冲突。皇太极与自己的兄弟、子侄等宗室王公（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一同进行斋戒后的一系列仪式，祭祀仪式完毕后将供品祭肉分发给宗室王公而在一起吃，可以说这是皇太极在向宗室王公让渡共同祭祀者的地位。事实上，以上祭祀中的实际情况象征性地表明，当时的清朝体制不是皇帝独裁的，而是以皇太极为盟主的爱新觉罗一族王公的联合政权。

五、结语

以上，从皇太极导入中华王朝式的皇帝仪式说起，通过介绍他怎样祭祀祖灵，怎样进献供品，而考察了当时清朝内外的政治情况和皇

太极本人的宗教观点。

皇太极在当时导入中华王朝式的仪式，有意识地创造了和满族传统的仪式共处的情况。祭天仪式也好，祭祀祖先也好，并没有排除满族传统的仪式，也没有将两者融合。这是因为，为了保持民族意识需要满族传统的仪式，为了成为中华世界的政权需要中华王朝式的仪式，二者缺一不可。

还有，当时导入中华王朝式的仪式，皇太极既没有虚应故事，也没有完全照搬中华王朝式的仪式。在太庙祭祀祖先的供品，如实的反映了这一事实。对照皇太极通过“有司摄事”来供献的食物和明朝所规定的供品，可知当时的清朝循照明朝的规定在非常认真的准备供品。只是，供品自身却大半来源于满族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① 《满文国史院档》天聪八年的译本，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9-129页；东洋文库东北アジア研究班译编：《满文国史院档天聪八年正文》，东洋文库，2009年。本文在参照以上两本的同时，主要翻译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文原件。

② マルセル・グラネ：《中国人的宗教》（东洋文库）栗本一男译，平凡社，1999年，第97页；葛兰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程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③ 《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崇德三年的翻译，有季永海、刘景宪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清初内国史院

另外，依照立足传统祖先祭祀原则上的明朝的规定，供品应该由皇帝家准备。但实际上是由皇太极的皇帝家和有势力的王公家协同准备的。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仪式中，只有继承君主之位的（即现皇帝）和指望将来要继承的（皇太子）才可以成为祭祀者，并在祭祀完毕后又能够享受供品。但是皇太极与宗室王公一同举行仪式，仪式完毕后再一同分享供品，以此来授予宗室王公共同祭祀者的地位。这象征性地反映了清初的体制不是“一君万民”的皇帝独裁体制，而是以皇太极为盟主的爱新觉罗一族王公的联合政权。

因此，皇太极虽然很热诚地导入中华王朝式的仪式，但根本上还是灵活地站在其基于满族政权现实的需要上。

满文档案译编》（上），第256-411页；河内良弘译编：《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崇德二、三年分一》，松香堂书店，2010年，第142-747页，这三本。本文在参照《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的同时，主要翻译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文原件。

④ 参见杉山清彦：《清初八旗における最有力军团——太祖ヌルハチから摄政王ドルゴンへ——》，《内陆亚洲史研究》，第16号，2001年。

⑤ 《明史》卷51，礼志5。

⑥ マルセル・グラネ：《中国人的宗教》第99页；葛兰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第66页。

⑦ マルセル・グラネ：《中国人的宗教》第101页；葛兰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第68页。